

鲁迅先生的感召力，随着岁月的加深而日愈加深。

鲁迅事迹考

鲁迅传

林辰文集

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

壹

山东教育出版社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

鲁迅传

鲁迅事迹考

林辰文集 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辰文集. 壹/林辰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28-6246-7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林辰(1912~2003)
—文集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2059号

编校说明

《林辰文集》共四辑。

壹 《鲁迅事迹考》《鲁迅传》

贰 《秋肃集》《鲁迅述林》

叁 《跋涉集》

肆 《诗农书简》

本辑收录《鲁迅事迹考》与《鲁迅传》。

《鲁迅事迹考》书中各篇作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一九四八年七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第一版，并于翌年一月、一九五〇年四月重印。一九五五年四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删去初版本中的《鲁迅北京避难考》、《鲁迅的婚姻生活》二篇，补入《鲁迅与读音统一会》；又将初版本中的《鲁迅与文艺会社》的有关内容改写为《鲁迅筹办〈新生〉杂志的经过》、《鲁迅与莽原社》二篇列入。该版至一九五七年又重印三次，累计印数达二万八千六百册。一九八一年三月，作者在初版和二版的基础上又作了一次修订，于当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第三版，篇目与开明版相同。

本书据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七月初版本付排。凡二、三版修订

之处，均由编者作校记附于篇末。二、三版的《后记》文作为附录列于书后。

《鲁迅传》四十年代初，作者在撰写《鲁迅事迹考》的同时，即开笔写作筹划已久的《鲁迅传》，至五十年代初，已写出八章。其中前二章及第三章上半部分曾连载于一九四九年由林如稷在成都编辑的《民讯》月刊第四、五、六期上，后几章因刊物停办而未能续载。后因工作调动，作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鲁迅全集》的编辑与注释中，不得已中止了《鲁迅传》的写作。已完成的前八章手稿一直藏于筐中（其中第六章手稿佚），未能结集公开出版。作者去世后的二〇〇四年五月，由编者据手稿整理校订后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第一版。

本书据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本付排。第七、八章的初稿曾发表在《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六期（一九四二年六月），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九月）上，现作为附录列于书后，以供参考。

《林辰文集》中的著作、文章多撰写、发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标点和文字的用法不尽符合现行出版规范，整理、编辑加工中，为遵循原著，在这些地方的处理上适当变通了目前通用的出版规范，例如全书中的公历纪年均用汉字表述，本应用顿号的保留了作者使用的逗号，本应为“地”字的沿用了作者所用的“的”字，等等。如此处理，我们希望能将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展现给读者。

目 录

鲁迅事迹考

- 003 / 孙序
005 / 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
018 / 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
031 / 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
036 / 鲁迅赴陕始末
044 / 鲁迅北京避难考
052 / 鲁迅与文艺会社
078 / 鲁迅与狂飙社
094 / 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
099 / 鲁迅的婚姻生活
112 / 鲁迅演讲系年
128 / 后记

[附录]

- 129 / 《鲁迅事迹考》第二版后记
131 / 《鲁迅事迹考》第三版后记

鲁迅传

- 141 / 第一章 家世及早年生活
161 / 第二章 无需学费的学校
169 / 第三章 由医学到文学
194 / 第四章 鲁迅在辛亥前后
206 / 第五章 在“五四”前夜
第六章 (稿佚)
227 / 第七章 海滨的遁迹
242 / 第八章 在钟楼上
262 / 一部“颇尽了相当的心力”的鲁迅传记(孙玉石)
——读林辰先生的《鲁迅传》

[附录]

- 285 / 鲁迅在厦门大学
——鲁迅生涯之分期的研究
300 / 鲁迅在中山大学
——鲁迅生涯之分期的研究

鲁迅事迹考

孙 序

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已经是整整的十周年了。

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敬仰爱慕他的万千青年，在这整整十年以来，如何以他的思想学术事业为根柢，从而发扬光大到如何宏远渊深的地步，这问题我此刻不准备述说。

这十年除了首尾两年以外，当中的八年，全民族正在与日本黠武主义者搏斗中；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当初也是东一鳞西一爪的，经过这八年的长时间，不仅组织不成片段，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这是严重的遗憾，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万千青年的，也是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世界人类的。

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却给我们减去了不少遗憾，增加了不少慰藉。全书共计论文十篇，从题目看，就知道每个题目都与鲁迅先生整个传记有关，整个传记就靠数十百篇这样的论文拱卫着。

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有的是他要选取的，有的是他要做旁证的，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这三类材料，在这拱卫传记的数十百篇论文中，必须尽量地罗列着。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例如鲁迅先生历次的演讲，对于整个传记也许并不重要，传记作者可能

不加选取,但是他必须有此知识:这便是第三类。又如章门诸子的事迹,并不算传记的直接材料,但传记作者必须拿它作为旁证:这便是第二类。至于与章太炎的关系,归国的年代,赴陕的讲学,曾否加入光复会,组织文艺会社等等,便都是第一类重要材料了。

罗列材料以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别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在《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一文里,记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辨证的发展,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这辨证的过程,最后才把《红星佚史》译者自己所作的一篇《发须爪序》介绍出来作为铁证,断定《红星佚史》绝非鲁迅所译。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里,因有“曾入”与“不曾入”两派的意见,作者仍以辨别材料,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勇敢的推断,把这个问题稳稳妥妥地解决了。这几种方法,既细密又谨严,供给将来的传记作者一个极可宝贵的参考。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或是另一位也好,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

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自然,说得广泛一点,凡属鲁迅先生的生前友好,和敬仰爱慕先生的万千青年,心头都有一篇或详或略,或粗或细的鲁迅先生的传记,但是放在心头和写在纸上似乎确是两件事。一旦动笔,即刻感到材料不够,印象模糊。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证论文的一位爱读者。

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继续写作这类考证论文若干篇,即使一时没有传记,我们读了这样细密谨严的论文,其快乐也不会下于阅读整本的传记,至少使以后的传记作者省却许多考证的工夫了。

孙伏园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缙云山

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都是“草字头”，^[1]一路的呵。’”

这是华盖集《补白》篇中的一段。就由于有这类冒牌的投机取巧之徒，使得本不会向人自炫的真的“草字头”，在革命^[2]成功以后，更加讳言自己的革命经历。像这段文字的写作者鲁迅先生，便是这种人中的一个。

当鲁迅留学日本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在那如火如荼的东京留学界的革命活动里，鲁迅也实际的参加了政治组织，成为光复会的一员。光复会约成立于一九〇三年^[3]顷，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主要的领导者为章太炎。^[4]后与兴中会，华兴会合并而成同盟会。^[5]它的会员，以浙江人为最多，鲁迅亦为浙东人的参加者。但他后来，无论在文字上，在口头上，都从未提及此事，故世间知道的人极少。直到他逝世以后，民国二十六年，^[6]许寿裳先生在《鲁迅年谱》里，才把这件湮没了将近三十年的事，郑重地提了出来：

民国前四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由这，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生活史上的这一件大事，更清晰地寻出了鲁迅后来所沿以发展的思想行为的早年的线索。这在我们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认识和研究上，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然而，却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人又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年谱》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部分，原是许先生就周作人所记增订而成，周在原稿内即未载人光复会事。在《关于鲁迅之二》里，他更以正面的坚定的语气，积极地加以否认：

但他(指鲁迅)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宇宙风》第三十期，后又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7])

因为有这正相反对的两说，遂致研究者纷纭莫定，或从许说，或从周说。前者如平心先生，他在《论鲁迅的思想》一书里，便据《年谱》肯定鲁迅为光复会会员，说：

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追求者，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页七二)

当时孙中山，章炳麟等所推动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震动全国了。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在革命的浪潮中。鲁迅在发

表上述论文(按指《摩罗诗力说》)的次年(一九〇八年),即“从太炎先生炳麟学”,并且加入了光复会。(页一九二)

又如欧阳凡海先生,他在《鲁迅的书》的第五节里,也说:

这年(按指一九〇八年)豫才不但努力翻译新文学,并且直接加入光复会为会员。推翻满清的革命,到这几年已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个角落里激荡,是在这样的时侯,豫才便也被卷入光复会里去的。(页七九)

还有胡风先生,在《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一文里,持论也与《年谱》相同:^[8]

由于《新生》底失败所引起的反抗,和“青年时候的愤慨激昂的意思”(《呐喊·自序》),这时候(一九〇八年)又在他底生命史上发生了一大事件:他加入了光复会。(《群众》八卷十八期)^[9]

在附注里,胡先生更举出他和鲁迅的一次问答:

“周先生加入过×××(原文)没有?”

“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10]

这样,除了《年谱》之外,又多了一项直接的材料了。^[11]

但另一方面,也有意见与周作人相近的人。如王冶秋先生,在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书内，便这样说：

鲁迅先生这一时期除了文艺以外，因出入民报社的关系，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人，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报社谈天。……可是结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会，似也没有入光复会。（《年谱》中作曾入光复会，知堂文中说并未加入，未知孰是？）（页一〇八）

这里虽未完全肯定，但语气上，是倾向周说的。（他说“似也没有入光复会”，不说“似曾入光复会”。）所以下文接着便说：“他对政治组织没有实际的参加。”（页一一二）这显然已是肯定地赞同周说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的意见以为《年谱》所说“为光复会会员”，是符合事实的。

鲁迅之赴日本，是在一九〇二年。自此以迄一九〇九，留日计凡八年。在这期间，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武装举义，连年不绝；而东京以活动较便，途程较捷等关系，当时简直成了革命的策动地。排满的各种集会，讲演，时有举行；各种书报，纷纷出版。革命空气，弥漫整个留东学界。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就是热情，睿智，旧学新知，都已具有根柢的鲁迅，又得接触各种人物，阅读各种书籍；感故国的飘摇，受异邦的刺激，在思想行为上，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出国以前，即已接受了“维新”的思想，到这时候，便自然的进了一步，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他遥对着“风雨如磐”的故国，立下了“血荐轩辕”的誓言和决心。他宣扬与波斯王大战的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讴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普式庚，^[12]裴兑飞……诸诗人的“摩罗”精神。他之决意学医，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13]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预备卒业回国，假医学“促进国人

对于维新的信仰”。他之放弃医学，改习文艺，是因为后来认清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文艺正是善于改变精神的利器。他介绍域外文学，特别偏重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是想用那些叫喊和反抗的声音来激励处境相类的自己的民族。他往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目的并非专为获取知识，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除了这些荦荦大端以外，还有一些细节，如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人心愤怒，同乡会开会追吊，鲁迅也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他热烈发言，还坚决地和不主张发电的人争论。（见《范爱农》）有一次，他从仙台回东京，特地中途在水户下车，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见许寿裳：王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而且就在留日期间，他便毅然将发辫剪掉了。由这种种，可见鲁迅这时的一切言行，莫不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通。在那时间，在那地点，他实在是有可能实际参加政治组织的。

这里，还值得特别述及的，是鲁迅当时所往还的那些人物。他在努力读书，作文，翻译以外，也和别的留学生一样，一有功夫，“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这时的交游自然是极广的。但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藤野先生》），“关起门燉牛肉吃”（《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4]）的无聊之徒，很看不惯。他所与交往的多是光复会，同盟会中人。如章太炎，是光复会的领袖，道德文章，革命勋业，彪炳一世，鲁迅曾从他问学，这里不用说了。章以外有陶成章，字焕卿，会稽人，光复会的中坚分子，与徐锡麟同为大通学堂的创办人（见国民党中宣部编：《革命先烈传记·徐锡麟传》），在江浙会党中极有力量，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与鲁迅往还颇密，后来鲁迅在所写的文字中，曾经一再提到他。其一，在《华盖集·补白》内：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其二，在《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内：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前者因有感于那些“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的冒充“草字头”，因而联想到陶的真正革命；后者由刘半农的印《何典》而被“正人君子”笑骂，联想到陶的“教人催眠术以糊口”而被清政府通缉。语句之间，是那么充满同情，亲切，敬佩，可见两人在二十年前的交谊之笃。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里，也有几句提到陶成章，可供参看：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连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